



“十五” 国家重点图书



翻译理论与实务丛书

罗进德 主编

TRANSL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SERIES

翻译教学：实务与理论

刘宓庆 著

3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H315.9
100

翻译教学：实务与理论

刘宓庆 著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翻译教学:实务与理论/刘宓庆著.——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3.1

(翻译理论与实务丛书)

ISBN 7-5001-1038-3

I. 翻... II. 刘... III. 英语-翻译-教学研究

IV. H31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66050 号

出版发行/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甲 4 号(物华大厦六层)

电 话/(010)68002481 68002482

邮 编/100044

传 真/(010)68002480

电子邮件/ctpc@public.bta.net.cn

网 址/www.ctpc.com.cn

责任编辑/章婉凝

封面设计/长 乐

印 刷/香河县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规 格/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20.5

版 次/2003 年 1 月第一版

印 次/2003 年 1 月第一次

印 数/1—5000

ISBN 7-5001-1038-3/H·304 定价:35.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为中国第四次翻译高潮贡献精品

翻译理论与实务丛书

总 序

中国历史上第四次翻译高潮正在神州大地蓬勃推进，方兴未艾，景况壮观。

中国历史上出现过三次翻译高潮：东汉至唐宋的佛经翻译、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和鸦片战争至“五四”的西学翻译。而目前这一次的翻译高潮，无论在规模上、范围上，还是在质量水平和对中国社会发展的贡献上，都是前三次翻译高潮无法比拟的。

这一次翻译高潮的出现，首先是全球信息时代降临的结果。信息爆炸、知识爆炸，同时也就是翻译爆炸。在今日“地球村”，离开翻译谈论知识信息，是不可思议的。同时，这次翻译高潮的出现又是以中国推行改革开放新政，走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代化强国之路为契机的。历史潮流滚滚向前。在人类高奏和平发展的大乐章中，翻译无疑是其中不可或缺的旋律。在中华民族复兴的大进军里，翻译必然是一支活跃的先头部队。

翻译，无论是作为文化现象、思想运动，还是作为一项职业、一种知识技能，总与所处的时代背景密不可分。翻译的观念、方法、样式、标准、风格，无不与时俱进。观察一下世界

范围和中国国内的翻译实践活动和理论研究,不难得出结论:翻译确实是人类精神文明中最富活力、最敏锐的领域之一。信息时代和市场经济,决定了目前这次翻译高潮最突出的特点。较之前三次翻译高潮,这一次的翻译高潮信息量更庞大,涵盖面更广泛,题材体裁更丰富多样,方式更灵活便捷,技术装备更先进,从业人员更众多,受益者更普遍,理论研究更活跃,人才培养更具规模。如果从经济学观点看,翻译作为信息产业之一支,现在所产生的经济效益也是历史上空前的。如果说前三次翻译高潮,都是外文译入中文为主,那么这一次翻译高潮则正在改变中国在翻译上的“入超”地位,对外介绍中国和外部了解中国的迫切需要,对中译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在新世纪的门槛上,我们欣喜地看到,翻译作为一种社会迫切需要、大有用处的知识技能,翻译学作为一门内涵深广的人文学科,在最近二十年的新时期有了长足发展。学翻译、教翻译、研究翻译、评论翻译和从事翻译职业的实践,已经成为与对外开放同步前行的社会文化热点之一,持续升温。翻译教学和译学理论研究,其规模之大、阵容之强、水平之高、成果之丰都是前所未有的,正引起国际翻译学术界的瞩目。中国作者的名字和作品在国际权威译学刊物上频频出现,正从一个侧面反映着我们的成就。翻译教学已经从语法为纲的语法复制型翻译模式中解放出来,已经分清了教学翻译和翻译教学这两个本不应混淆却曾长期混淆的基本概念,大学翻译课不再是外语教学的手段,而是在双语知识基础上培养口笔翻译技能的高级课程。翻译理论研究继文艺学、语言学之后,又有了美学、语篇分析、社会符号学、语言文化比较研究等从多角度研究翻译的方法或理论工具,为确立翻译学作为一门以翻译为研究对象的,开放的,跨学科的人文科学的地位奠定基础。有关翻译的知识大大地丰富和深化,使越来越

多的人认识到：翻译及其理论研究不应是应用语言学的一个分支，而应享有独立的学科地位。翻译教学和理论研究领域这些可喜的变化，无疑对造就高水平的翻译人才、提高我国数以十万计的翻译从业者的业务水平和工作质量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理论与实践互动，是翻译事业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在这方面有两个良好趋势值得注意。一是随着新一代翻译工作者和翻译教师、翻译研究家的迅速成长和翻译学科的壮大(以翻译学和翻译理论与实践为方向的硕士研究生教学点已有近百个，博士点约有十个)，以及众多翻译学术刊物的出现，学术论文的发表，学术专著的出版，特别是由于译学研究成果的可信和有用，“翻译无理论”和“翻译理论无用”的声音，除了极个别场合外已经不大听得到了。这当然是个积极的变化。二是译学著述不再是文学翻译家和大学翻译教师的专利，各行各业从事翻译工作的有心人，他们挟着丰厚的实践经验，迈步跨入这个领域，著书立说，带来一阵阵清新气息。这方面以科技翻译界贡献最为突出，其他如外交、贸易、金融、工商企业、编辑出版、对外宣传等各界，也都有作者涌现出来。翻译实务的经验以此得到总结，得以条理化、系统化，为后来人指点门径，同时也为我们的译学建设作了贡献。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相互为用，有血有肉、骨肉匀停，这一趋势无疑是健康的，值得欢迎的。

这套“翻译理论与实务丛书”正是在上述喜人形势之下应运而生，编辑出版的。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作为国内唯一以翻译为特色的国家级出版机构，成立二十多年来已经陆续编辑出版数十种翻译理论与技巧类图书，其中若干种已经成为翻译研究或教学领域脍炙人

口的必读书,在国内外翻译界赢得了声誉,奠定了公司在译学书籍出版方面的领先地位。尽心竭力继续为翻译界广大专家、学者、教师、从业人员、学生和人数众多的翻译爱好者提供高质量的专业读物,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现在,在已有的成绩和经验的基础上推出这套“翻译理论与实务丛书”,我们有几点想法:一、加强自主策划,提高原创性,体现信息时代和市场经济环境下翻译的新任务和新特点;二、加强实用性和针对性,不仅要反映翻译教学和研究的新趋势、新成果,更要关注科技、经济、法律、贸易、金融、旅游、传媒等非文学领域的翻译实务;三、笔译与口译兼顾,英译中与中译英兼顾,着重于中英互译和中译英;四、有选择地引进境外著作,港台海外华人翻译家和翻译理论家不乏佳作,立足中华语言文化,有其独特魅力,是我们的首选。

这些想法能不能实现,能不能把我们贡献精品的愿望变成现实,全靠翻译界广大学者专家、学校师生以及广大读者的支持与合作,没有这种支持与合作,我们的想法再好也只是空话而已。我们所期待的支持与合作,既包括惠赐书稿、推荐选题、介绍作者,也包括对我们已出的书发表评论,无论是表扬还是批评,都将鼓励我们把工作做得更好,是我们无任欢迎的。

丛书主编 罗进德 谨识

翻译教学的导师

——刘宓庆教授与台湾师大之缘

随着国际往来之密切，国内社会各领域翻译之需求日益增加，但对翻译工作之定位仍缺少共识。在实务上，不论口译笔译：翻译工作常被视为劳力密集的初等产业。在学术界，翻译更一向难受肯定，未能成为独立之学门。

笔者多年来一直开法国某厂牌汽车，常感觉汽车本身性能不错，只是小毛病经常不断。某日将车开去车厂保养，与厂长闲谈中，好奇地问道为何该厂牌汽车在欧洲销路颇佳，不亚于BMW或VW，在台湾却一直不受欢迎，业绩低落，无利可图。厂长答复说，十多年来，该车原厂修护文件全部为法文，从不提供英文译本；而台湾的代理商每次收到的法文修护文件要翻译不计微酬献身于教学研究，因而能维持最佳师资阵容，亦因此每年均能招募到最优秀学子投考，保持相当的学业水平。此项人才资源是本所最珍贵的资产，也是我们贡献社会的最佳保证。

刘宓庆教授曾执教于北京大学、厦门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等校，并在联合国多个组织任专职翻译，且在欧美工作多年，在翻译理论之研究、实务经验、教学成就上都享誉极高。1999学年度，本校邱汉平教授因主持“翻译、文学研究与文化翻译”整合型研究计划，邀请刘教授来台任客座教授，参与研究

计划。经台湾师大文学院施玉惠前院长及本所前所长何慧玲教授与其多次恳谈，获得首肯，愿意放弃香港及大陆等地礼聘，前来本所加入研究，协助提升台湾翻译理论研究之水准。刘教授在本所两年期间，不仅积极参与研究计划，且热心义务担任“中译英实务”及“翻译理论研究”等科目教学，几乎全部时间都在研究室中孜孜不倦地研读著述、批改作业，或是在教室里谆谆讲学，为这个创设伊始的研究所注入了巨大的研究动力。

刘教授来台之初，适笔者接任本所之行政业务，因早已仰慕其学术渊博、著作等身，在接待事宜安排上，相当惶恐，常担心若有疏失，有所得罪。事实上，初次见面，便深为他谦虚自持、平易亲切的学者风范所感。此后年轻同仁向他常有所请益，本所学生修习他所授的科目，除了在上课时亲聆教诲、沐浴春风外，课后也常在他亲切的提示中备受关怀；刘教授研究期满，必须束装离台之际，全所师生更是依依不舍，所幸刘教授已面允，待本所成立博士班时，仍将翩然再来，共商教学大计。我们自然也将此一约定铭记在心，希望早日得以实现。

在台湾师大翻译所两年期间，刘教授研究著述的成果，大部分都包含在这本新作——《翻译教学：实务与理论》里。刘教授将翻译实务工作以及各项翻译理论做成一套体系较完整的翻译教材及教学手册，并对翻译教学理论作了探索。在中文书籍里，有关翻译理论的讨论文献固然不少，但以教学为纲、实务与理论兼顾的著作则是一项创举。这本著作的问世，定能成为教师教学与学生研习翻译的重要文献，对于提升中文翻译研究与教学水准也必大有裨益。我们拜读之际，除了感念作者对翻译教学的贡献，更特别怀念刘教授在台两年与本所师生的深厚情谊，因为刘教授一再赞许台湾师大在教育文献方面之典藏完整，以及翻译所学生的资质优秀、勤奋向学。对于本所能在刘教授新作创作过程中有所参与，我们诚与有荣焉；但愿翻译教学品质的提升，能带动翻

译研究水准的提高与翻译实务工作的地位，也希望不久之后，台湾师范大学翻译研究所能更上一层楼，刘教授得以实践允诺，早日来台，再续前缘。

周中天教授

台湾师范大学翻译研究所

自序

我一生所做的不外乎三件事：做翻译，教翻译，研究翻译。为此，我绕了地球一个半圈：从中国大陆到美国，然后到欧洲，1990年由巴黎抵达香港。1998年我告别了香港中文大学，到爱尔兰都柏林大学进行文化翻译调查，后经美国于1999年秋到达台北，执教于师范大学翻译研究所。“三十年寻芳，留下一片相思地”：我特别能理解宋代诗人叶梦得的这种心情，不过我心中想的不是芳草。我也常常作故国神游，在内地、港、台寻找自己的足迹。在台北，我的学生是二十几位相当优秀的翻译专业硕士生。有一次，其中一个女孩问了我一个狡诘的问题，使我一时答不上来。她说：“老师，是翻译选择了你，还是你选择了翻译？”

老实说，这个问题，到现在我都答不上来。人生很多事是客观情势和机遇与主观情志的撞击、抗争或聚合、凝结。我从事翻译、做翻译研究受到我的师长北京大学朱光潜教授极深的影响。朱先生的指引是磨励我的青年情志的力量之源。朱先生写给我的信札，历经人生颠沛，今天仍然在我手头。至于说客观情势和机遇，你想回避、摆脱也是枉然，因为你所遇到的挑战如此严峻，它像一头恶兽，专吃告饶的“软骨头”。我庆幸自己具有我国楚人那种“一息尚存，永不言败”的情怀，认定一条要走的路，就不要怕荆棘、不要怕陷阱，也不要怕人暗中伏击。我认为人生最大的挑战莫过于外人对自己最珍爱的信念的挑衅与否定。俄国作家陀斯妥也夫斯基将这种挑衅称之为对“心灵的凌辱”。他对朋友说，要洗雪这类凌辱，只有两种办法，“一是醉死”，“一是战死”，他“宁愿战死”。

在众多的“心灵的凌辱”中,我最不能忘却的是两件事。

上个世纪 80 年代初期,我在美国纽约州立大学阿巴尼(Albany)分校听过一场关于跨文化问题的演讲。我同排右边坐着一个自称是“学者”的英国人。闲谈中他用挑衅的凌辱口吻反问我:“你们中国也有翻译研究?”听完我的反驳,他自以为很幽默地说:“翻译菜单、洗衣单之类大概用不着这些吧,不是吗?”

另一件事发生在 1989 年,当时我住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东区,在布鲁塞尔大学听哲学课。

我跟一对英国男同性恋合租一套房间,中间是客厅,左右两厢,我住一厢,大家共用厨房。那个“女人”自称是“a smart aleck”(自以为样样都懂的人)。有一次在厨房做菜,我跟“她”偶然谈到莎士比亚的中文翻译。那个“男的”突然冲进来,莫名其妙地对“女的”挥动双拳咆哮说:“你跟他谈什么翻译?!中文能翻译吗?那是坦克的语言!”

后来的许多年,每当我做翻译、教翻译或研究翻译遇到困顿时,就想起这两件事——当然,更有朱光潜先生、王力先生、俞大纲先生、齐声乔先生、高名凯先生、吴兴华先生和北大许多师长、学长的叮嘱。

我的信念是:中国人应该有自己的翻译理论,应该有传承于我们两千年来译论前辈的翻译理论,应该有利于我们灿烂的民族文化发展前景的翻译理论。因此,我在自己的一些学术研讨会发言及著述中提到我们的翻译理论应该有“中国特色”(“中国特色”一词我 1987 年第一次在香港用的是英语“Chinese touch”:“the Chinese touch in translation studies”)的问题,也几次在学术会议上提到过我们的理论应该有一种“中国气派”(“touch”也可以译作“气派”),不赞成世界上存在什么“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翻译理论体系”(后来我才发现不少批评我的人都在挖掉了“体系”两个中心词 headword 以后做文章,有人也借此作政治引申和批评)。直到

2001年5月,我才从台湾同行那里知道,“特色论”备受香港和内地一些人的责难。有人作了政治曲解,甚至被扣上了“大汉族主义”的帽子;^[1]也有人提到我说过西方当代译论像是“儿童积木”。其实这是在断章取义,扩大了我的所指。我当时只是针对我们有些同行不假思索即倾服于英国的 Peter Newmark, Susan Bassnett 和美国一些学者的某些经不起推敲的论断而言。而且,更重要的是,当时我主要是说我们中国人自己,不要不分青红皂白,甚至把西方学术当作“洋图腾”(Western totem)。我们的学术研究立论,纯属天赋人权,不必得到西方“权威”的认可才能过关立足。^[2]他们怎么说,有他们自己的道理;我们要能择善从优,发展我们自己的理论。^[3]

不过,既然对我提出了如此这般的指责,我现在也在这里作一个非常严肃的回应。我认为,每一位严肃的学者,都有自己做人、做事和做学问的理念,也很难不受到他所恪守的理念的规管。我出身于寄望“以洋务救国”的世家,“外为中用”中的“中用”则是进取的洋务派的“理念酵母”。洋务运动的惨败和我们家族因此而承受的没齿不忘的屈辱给我们带来了一条世代相传的家训——一切必须建基于自强:小至个人,大至国家,莫不如此。将自我生存、国运昌顺或民族复兴寄望于“洋人”的扶掖,无论在帝国主义横行的19世纪、霸权主义扬威的20世纪,抑或在“中国威胁论”行将此起彼伏的21世纪,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人类历史不可能出现“抽刀水断”的奇迹。口袋空空的人要走向“全球化”、“国际化”、“与国际接轨”,如果不是白日做梦,就是自我解嘲。在我看来,哀莫大于失去文化自我。事实上,西方有西方的成就,中国有中国的特色;西方文化中有东方的智慧,东方文化中有西方的劳绩。学术文化思想的发展历来是一种互动、互补的交流运动,与自然规律一样。人类文明是全人类的集体创作。世界文化是一个多维结构,“单边主义”既不符实际,也不切实际。维柯(Gimabattista Vico, 1668-1774)

的历史循环论和马基尔维利(Niccolo Machiavelli, 1469-1527)的权术至上论都只是世界政治史和学术史上的一现昙花,或许有过短暂的、偶尔一见的“历史效应”。但时至21世纪,世界上各国和各民族还是越来越懂得自尊和自珍,自励和自强的真谛。

至于说我们的翻译理论(即有汉语参与的翻译理论)要不要有“中国特色”,这就牵涉到一个基本的学术信念和认知了。我认为翻译学是一门经验科学,翻译的理论、原则、原理、规范的构建,必须基于经验,即具体的翻译行为,而具体的翻译行为必然是在两种(或多种)具体的语言之间、由具体的人来执行的,而这个“人”又必然是在某种具体的人文环境中、操某种具体语言(即其母语)的人。因此,翻译经验必然表现出两种属性(attributes):一是共性,即 universality,就是说凡是翻译行为就必然具有的属性。二是特性,即 particularity(peculiarity),就是说凡是涉及某种具体语种(如汉语)的人所进行的翻译行为就必然具有的特性(例如汉语语法范畴呈隐性,模糊度很大,从而衍生出汉语之以词汇手段代替形态手段,等等)。我们既要研究翻译行为的共性,更要研究翻译行为的特性、个性。因此,我们说针对有汉语参与的翻译行为的翻译研究必须而且必然具有中国特色,这是自然之理。这时的“中国”,只具有“范畴意义”,是一个“范畴符号”(categorical sign),涵盖广义的“中国”思维方式、人文现象、典章制度、风格技法及至民俗国情,犹如中国美学、中国法学、中国诗学等等,这中间根本不存在政治或地缘政治涵义。而学科、学术研究之具有地域特色则几乎是常规。^[4]中国翻译理论的特色指有汉语参与的语际转换的原则、原理、参照规范的理论描写,这种描写之所以必然表现出特色来,还因为汉语具有极丰厚的历时性人文背景和极复杂的共时性人文环境,具有独特的语言文字结构和语音、语法系统,具有独特的思维方式和思维风格,因而具有独特的文化表现方式(mode of expression)和审美表现系统(system of expression),广泛涉及中华文化中的人文历史

观和审美价值观念。这方面,我们只能说领悟还非常浅薄,因而,未能使很多人产生足以驱使他们投入深层研究的实感、关联感和紧迫感。这一点,我们只要关注并深一层分析一下施莱马赫有关翻译的立论中的德国历史文化思考就会有所领悟。可以说今天德国的译论家没有一个不铭记施莱马赫的教诲。这正是德国的理论传统和生命力之所在。可见,在强调研究翻译理论的共性的同时,也强调研究翻译理论的个性、特色、特殊性不仅不是什么“错误”、“误区”,而且是非常必要的,是完全符合科学的。把学术研究取向问题政治化为“大汉族主义”,点名在刊物中张扬,尤其不妥当。

另外,我所说的“中国特色”,还有一些特殊涵义。其中之一是理论研究和建设的基本取向。我比较赞同传统的中国方式:重基础研究,在扎实的基础研究的基地上发展,学科创建才不至于“泡沫化”。可以说,学科建设和发展的关键在基础研究。基础研究越坚实、雄厚,“上层建筑”就越易于建树、扩展、提升和创新。例如,中国自然科学中的数学、物理学、地质学、天文学、医学就是这样,它们有今天世界公认的先进水平主要得益于长期坚实的基础研究。人文科学也一样,中国传统语言学、文学、史学、美学与哲学的基础研究之雄厚世人无不赞叹。就算由于历史原因一时滞于发展,弱于创新,但一旦时序推移、思潮推进,就一定会有一批有志者、革新者出来为这些学科洗涤尘埃、再添异彩,使其旧貌换新颜,果然依旧处于世界前列。我80年代初进入翻译研究领域以后,发现中国传统译论的理论思想与中国哲学与美学相依相衬,因而不可谓不丰厚。但时代发展了,价值观发展了,研究方法论发展了,因而又亟需改革或推陈出新。但改革也好,推陈出新也好,都不应该弃传统(译学传统和国学传统)于不顾,一切重起炉灶。法国人说得好,人文科学的“灵魂”是既有现实感,又有历史感。一切传统理论中已往提出的问题都必须用现代科学加以审视;一切传统理论中没有提出的问题,都必须用现代科学加以添补阐发。让现代

从历史中得到原生 (protoplasmic) 基因, 让历史在现代中得到再生活力。我想如果懂得这个辩证关系, 理论研究者之间的共识就会多得多。否定传统、抛开传统; 或昧于国学, 抱住一个“洋图腾”, 将一堆洋文献“注”来“注”去, 是没有什么意义的。过去三四年中我受托拜读了许多在美、英、澳、加读博士学位的翻译专业博士生论文, 这样的论文, “洋则洋矣”, 但读来实在是非常虚浮枯燥; 通病大抵是缺乏“国学风华”, 我真与钱穆先生同有“怅然之感”。我这里绝不是无端端发什么忧国忧民之慨: 我国翻译学之建设, 舍国学根基断无前途! ^[5] 回顾 20 世纪 80、90 年代, 香港各大学中的不少社会科学学科讲台上充斥的是盲目附和乃至五体投地崇拜欧美, 且明显歧视中华文化的浅薄论调, 使我惊诧; 这几年, 香港的社会科学深层研究日趋空洞化, 研究精英甚至后继乏人, 国学研究生在港就业难乎其难! 这种种现象, 原因盖出于香港教育中长期忽视本国文化、忽视“国学”(中国文、史、哲、艺), 长期没有对“殖民地基因”排毒清肠! 今天, 人们已经慢慢看清了: 全球化、国际化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一面, 另一面是本土化、特色化, 二者相辅相成, 其中任何一面的失衡, 都可能引致消极的甚至严重的后果。预料 21 世纪将不断出现这类“失衡性”矛盾和冲突。一切取决于人类是否有足够的聪明才智, 因势利导, 不断调节二者的平衡发展。

我的一些批评者常常只看到我强调“中国特色”的一面, 似乎并不留意我对翻译共性的系统论基础研究。有一个时期, 结构主义对我有影响, 但我在欧洲和香港的时候——可以说整个 20 世纪 80、90 年代我更加潜心研究的是功能主义, 特别是功能主义的目的论 (teleology), 对我影响最深的是维根斯坦。可以说, 我的基本观点是功能主义的, 但我认为结构主义也有可以借鉴之处, 不能盲目排斥。在我看来, 传统的中国学术研究, 属于有序性生长型, 强调节节有序、循序发展提升。这也可以说是结构主义的, 要注意的是应努力突破“历史语境”的框囿; 西方学术研究属于无序性创造型,

强调原创爆发,在实证中积蓄发展力量。这实际上是功能主义的,要注意的是深及深层系统的探索。我希望将二者结合来研究翻译学,但以功能主义来指导整个基础研究,包括意义理论、文本理论、翻译传播理论、翻译审美理论、文化翻译理论、翻译对策论(应用理论)和翻译教学理论。与此同时,在任何一个领域中,我都试图以科学的结构分析方法、系统分析方法和关系分析方法来理清研究对象的“存在形式”和“关系形态”(M. Heidegger, 1962)。有些批评者认为我只关注立国人之言,甚少涉及西方译论家(大师除外)的见解并作评论、参证、探讨。我承认我的这个倾向。不过我认为,我们与西方同时代的同行都是在同一个阵线上向前奋进,国人不必向隅自卑,大家都应互相鼓励,实现双向或多向的支持和学习。汉语是 13 亿多人的母语。21 世纪必然会出现中华文化复兴。我们的西方同行开始诚心关注中华文化与中国译学研究成果,大概事不宜迟。^[6]我在香港和内地常常听到中国同行在言谈中自叹“比西方译论落后二三十年”。其实自卑与自满都没有益处,关键在与时俱进,自强不息,才能真正走出总在自惭形秽中迷失的“误区”。我们既不要做国粹派,也不要当虚无主义者,理由是“各持一端而不让”是一种非理性态度;而且更重要的是,它既不符合我们的历史事实,也不符合我们的现实要求。海德格尔说得好,“让存在展示它本身的魅力”。巧言诡辩、断章取义、制造对立、圈霸地盘、不容异己甚至剽窃沽名等等实在是 20 世纪的一种“世纪末学术病”征候群,令人厌恶。让我们大家都来做新世纪的新学术人。

这些年来,除了教学、改稿,我几乎走遍内地、港、台三地,将全部精力都放在翻译学基础研究上,方方面面,领域很宽,恒患蜻蜓点水,贻误后人;而任何人的能力都是很有限的,不可能面面俱到。做学问各有各的理念,各有各的路子。我的不少同行长期潜心研究、引介西方译论,成绩斐然,我是很敬佩的。我本人长期作为理论研究者,当然也应该说自己难免于顾此失彼,只好请大家多多